



1987

第三輯

南宁市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南寧文史資料

贈閱



南宁文史资料

1987(2)

总第三辑

4104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抗战前桂系和共产党的关系.....陈大文(1)

纪念抗战五十周年

记抗日战争时期广西空军的十大空战.....韦楚生(18)

甘洒热血卫神州.....陈策汉(40)

南宁西郊民众抗日实录.....宁广居 卢汉宗(45)
宁耀东 卢裕辉

桂南第一次光复后的整军.....阳丽天(54)

抗战时期南宁的妇女运动

.....刘洁明 张若冰 邓 铭(60)

南宁动员委员会和难童保育院.....谢启藩(68)

人 物 简 介

只念苍生不忆乡——烈士高孤雁简介.....温松生(75)

我所知道的俞作柏和俞作豫.....谢伯达(77)

老同盟会会员雷鲲池.....梁上燕(82)

地 方 风 云

忆白沙旧事.....雷正光(94)

桂系遗事

- 无可奈何花落去——桂系头目出走见闻……唐超豪 (100)
- 从南宁的贩毒活动看新桂系集团的“禁烟”……滕肇文 (107)
- 吕清夷“促陆倒袁”……周克邦 (112)

邮电史话

- 南宁解放前的邮电通讯……雷纶宇 (114)

艺术之窗

- 广西国防剧社和初期的国防艺术社……廖曼心 (124)
- 葛阳古戏台……王兆梅 崔志光 (127)
- 《南宁大事记》(三)……雷成 (130)

抗战前桂系和共产党的关系

陈 大 文

一、桂系对共产党政策、策略的演变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都容纳了一些共产党员。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都不是左派，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李、黄、白都是积极的参与者，逮捕和屠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这时候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斩尽杀绝。一九三〇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重新统治广西，他们对东兰、凤山的红军进行了野蛮的围攻和残酷的镇压。这时候他们对共产党采取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一九三三年夏，桂系军阀应蒋介石的要求，派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率所部两个团（后来又增加两个团）前往江西“协剿”红军。但这次桂系军阀参加对红军的“围剿”，并不想真正地消灭红军。因为红军的存在和发展，吸引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使蒋介石暂时无力用军事手段解决两广问题。白崇禧曾说：“老蒋一天剿共未了，就一天不来搞我们。”（注一）这就说明江西红军的存在，成为两广军阀防御蒋介石的屏障。王赞斌率领部队出发时，白崇禧谆谆告诫他们：“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补给来（按：蒋介石对“协剿”的部队

答允补给经费，而中央军的编制大，待遇高，所以两团人可以换回四团人的经费），同时你们也不能损失一个兵，一枝枪，这是主要原则。”（注二）所以王赞斌到达江西后，除了屠杀无辜的居民以外，为了避免损失一兵一枪，实行深沟高垒、只采取封锁和遥相对峙的态势，避免与红军接近，即使有时派些部队出击，不论胜败，都要迅速撤回原防，不许胶着。（注三）这时，桂系对红军的策略是“堵而不剿”，保存自己实力，坐山观虎斗，让蒋介石被红军拖住手脚。

当时两广军阀提出“抗日剿共”和“反对独裁（实为反蒋）”的口号，叫得最响的是抗日。但两广军阀深知，在近期内对他们生存的最大威胁是蒋介石。如果红军的力量削弱了，或者江西红军的主力被迫转移，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就很有可能压红军进入两广并接踵而入，那时两广地盘就会被蒋介石所占有。要不要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妥协来对付蒋介石？这是两广当局所须要考虑的问题。近年已发现的事实表明，广东陈济棠当年为保存实力并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腹地，对红军就是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通”的策略。他表面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式，暗地里却派人对红军作试探性的和谈。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陈济棠电约红军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红军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派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人密谈，达成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陈部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等五项协议。陈济棠执行了协议，红军在很短时间内通过了陈的管区，即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对红军和党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了重大作用。（注四）

抗日战争前那几年，桂系对外联络工作的总负责人是王公度。王公度要联络共产党，须得李宗仁的同意，李宗仁要联共也通过王公度去执行。一九三四年王公度把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留苏同学刘仲容介绍给李宗仁。刘仲容在广州与李宗仁会晤时，李滔滔不绝地大谈其抗日反蒋的主张。刘仲容对李宗仁说，无论是反蒋或是抗日，都必须加强和各方面的关系，尤其非和共产党联络不可。李宗仁十分赞赏刘仲容的意见，于是他要刘替他担任对外联络的工作。具体安排由王公度和刘研究、联系进行。（注五）李宗仁赞赏刘仲容的联共主张并安排刘做联络工作，这说明李宗仁对共产党的态度有了重大的改变，即由反共而改为联共了。但他的联共是指他的统治区以外与共产党组织建立某种秘密联系，而在桂系集团统治地区，对共产党的活动还是严加防范的，也即是所谓“外联内防”的策略。

二、派刘少南与吉鸿昌联系

胡华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不朽民族英雄吉鸿昌》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记事：

一九三四年八月间，吉鸿昌派往安徽进行兵运工作的人员被捕，吉鸿昌在天津组训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也相继暴露。蒋介石急令北平军分会逮捕吉鸿昌等人，党组织通知吉鸿昌速离天津。吉鸿昌因经手的几批武器尚未运到，准备会面广西李宗仁派来的抗日反蒋代表也未到达，决定暂时留下，于十一月九日晚，转移到天津国民饭店四十五号房间。当他以打牌为掩护，正在房间内与广西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秘密会谈时，突遭国

民党特务闯入枪击，刘当场被击毙，吉鸿昌胳膊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

吉鸿昌曾任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因反对国民党进攻中国工农红军，被蒋介石强令出国，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等职。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到北平、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这次李宗仁派刘少南跟吉鸿昌联系，是把吉鸿昌作为抗日将领联系还是作为共产党人联系呢？联系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当时的形势看，日本侵略的矛头是指向华北，暂时没有向华南采取军事入侵的姿态，两广当局也没有采取抗日的重大措施。一九三四年八月，任弼时、肖克率领红军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桂系当局即认为这是红军主力转移的迹象，连电蒋介石请准将王赞斌师调回广西防堵，九月蒋介石复电照准。但桂系的军队只有十八九团人，如蒋介石压红军入桂，并以数十万大军跟踪而入，桂军则很难抵挡。当时李宗仁认为：“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不网开一面，也应将决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决口开向西南，压共军西窜。”

（注六）“民国二十三年九十月间，共军先遣部队万余人在肖克率领之下，窜至湘、桂边境，全军（指蒋军）十余万人随后跟进，有入桂模样。”（注七）面临这样的情况，李宗仁怎不担心蒋军压红军主力入桂并尾随而入呢？这应该是

李宗仁派刘少南与共产党人吉鸿昌联系的原因。联系的目的当系与共产党订立某种协议，规定红军不进广西腹地，而李、白则让出一条路给红军过境。

蒋介石也猜疑李、白有通共的一着棋，他的宣传工具在海内外大事宣传，说截获了李、白给红军的电报，指责李、白勾结“赤匪。”（注八）蒋介石还布置他的特务密切注视李宗仁派出的代表与共产党人接触的蛛丝马迹，乃有刘少南被击毙之事。

红军长征接近广西的时候，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刘斐（白崇禧的高参）等曾商讨对付红军的策略。他们认为桂军只有两万，红军有二十万，正面堵，桂军可能被红军吃掉；蒋介石一再电令桂军堵截红军，其阴谋为待桂军与红军两败俱伤时，乘机大举入桂。故决定对红军的总方针是设法不让红军进入广西内地，宁肯让出一条走廊给红军通过。刘斐说，概括起来是两个字：“送客”。因而对红军作战的方针是“打尾不打头。”（注九）也就是“追而不堵”的策略。

红军接近广西边境时，有王建平者（广西平乐人，与白为保定同期同学，私交甚厚，已混入蒋介石集团参与机要）从上海密电白崇禧：“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三害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注十）白崇禧接获情报后，立即变更部署，调重兵守住龙虎关，让红军主力轻易地越过湘桂边境的灌阳、永安关、文市、石塘，好象双方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蒋介石看到

桂军没有堵截红军，愤怒地急电白崇禧责问说：“共匪势蹙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注十一）白崇禧复电驳斥并揭穿蒋的阴谋说：“职部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则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乎？”（注十二）蒋置之不复，只饬向贵州尾追，勿得稍纵。

根据上述情况，李宗仁派代表刘少南与中共代表联系，意图缔结某种协定，应属意料之事。

这里须要说一说，桂军并非“送客”。白崇禧非常狡诈，一俟红军主力通过，立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对红军后卫部队发起了攻击，展开了恶战，双方都有损失。（注十三）白崇禧此举既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能向蒋介石交差，并堵蒋军入桂，是很恶毒的一着棋。

三、刘仲容与中共的联系

一九三五年冬，王公度与刘仲容商量要设法争取张学良与杨虎城。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驱使张、杨继续进攻红军，有消息说，张、杨部队厌恶内战，倒是想抗日。随即李宗仁、白崇禧请刘仲容去西安走一趟，了解一下西北的情况及张、杨的动向。刘仲容从南宁出发先到天津同中共地下党员南汉辰、王世英、谢甫生等接头，谈了李宗仁的最近动态，替李宗仁同中共取得了初步联系。中共方面对李宗仁倾向于抗日表示赞赏。（注十四）

李宗仁在天津设有秘密机关，从事情报和联络工作，这个机关设有秘密电台。中共和这个秘密机关有统战关系，这大概是刘仲容到了天津以后的事。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共中央代表云广英就是通过这个秘密电台的联系前来广西的。（注十五）

四、“两广事变”时，云广英、胡鄂公来桂；

钱寿康赴陕北

在一九三六年的“两广事变”（广西习称“六一”运动）期间，中共与桂系的关系，载在《广西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第三版谭纪、黄茂田写的《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的历史意义——纪念中国共产党广西代表大会召开五十周年》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两广事变”发生，中共中央在这一事变中支持桂系实力派的抗日行动，号召民众拥护李宗仁的抗日主张，可能时与李宗仁订立正式合作协定，推动李宗仁在广西范围内即刻执行抗日反蒋的各项纲领（《我们党在广西的任务》，见《火线》第59期）。一九三六年九月，中共中央同桂系实力派正在积极交换意见，商订抗日救国协定。

毛泽东在《论团结御侮复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书》（此信未收入《毛泽东书信集》，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民族战线》第二卷二、三期。该刊为李济深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机关刊物）中曾说：“我们曾经和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合作，最近两广诸领袖通电抗日，我们又宣布愿意与他们密切合作。”可见中共中央确是支持桂系

实力派的抗日主张的。但当时中共中央对“两广事变”并没有肯定它是抗日行为，以后也没有作这样的肯定。《毛选》第一卷第260页对“两广事变”作了这样的注解：“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军阀陈济棠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假借‘抗日救国’的口号，联合反蒋。”上面所引《火线》第59期《我们党在广西的任务》一文中所说要推动李宗仁在广西范围内即刻执行抗日反蒋的各项纲领，不但无其他资料可以查证，而且与中央的重大决定相矛盾。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放弃反蒋口号，红军发出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注十六），也就是改而采取迫蒋抗日的方针。那么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以后，怎么还推动李宗仁执行抗日反蒋的各项纲领呢？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是要反对的，是要批判的，但这是为了迫他抗日。

在“两广事变”中，到底桂系和中共的关系怎样呢？

先说中共中央派云广英来广西的情况。

“两广事变”后半个月，李克农找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云广英谈话，他说：“六月一日两广发生事变，广西的李宗仁和广东的陈济棠等联合搞‘反蒋抗日’活动，并发出通电，这无疑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战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必要的和有利的。”李克农认为云广英对两广情况比较熟悉，由他出去活动是合适的。过几天李克农和云广英到中央办公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等领导人在座，周恩来对当时形势作了分析，明确地指出工作的任务。又过几天，中央派白坚陪云

广英去天津。

云广英到天津后和北方局的王世英取得了联系。王世英对他说：“‘两广事变’真相我们这里也不大清楚，但他们同蒋介石闹矛盾是无疑的。对我们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同我们联合‘迫蒋抗日’是很必要的。”第二天，王世英告诉云广英，陈济棠已逃离广州去香港。并说已和李宗仁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的负责人谈过，由他们发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告知云广英（化名林秀先）不久就要到南宁。

云广英大约是八月初到达南宁的，到南宁后的第二天就到李宗仁的总部会见李宗仁。李宗仁 and 云广英握手并微笑着说：“我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今天得到会面，很好。”接着就问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云广英和李宗仁单独会谈，因为云还不了解“两广事变”的真实情况和桂系的意图，他只讲了以下几点：第一，说明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第二，中共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因为他长期以来不顾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云广英最后说：“我们党中央这次派我到广西来，就是商谈关于合作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有全国各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促进全面抗战高潮的到来，那我们就一定能战胜日寇，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云广英谈这些问题时，李宗仁没有插话，但多次点头说对，最后他说：“林先生的讲话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我们正在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我们互相配

合。”李宗仁又说 he 工作较忙，以后由王公度跟他联系交谈。

过几天孙侠父（曾任察绥抗日同盟军第五师师长，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是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代表）来看云广英。他告诉云广英，香港的党组织已派胡鄂公等到南宁来，对广西当局进行统战工作，他本人是陪同胡等来的。第二天，胡鄂公来看云广英，云说：“我出来工作的任务，是向他们（指李宗仁等军政领袖）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争取他们同我们一道进行抗日的斗争，我们从多方面进行统战工作，对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来迫蒋抗日是有利的。”胡没有异议。

云广英还和李济深进行了会谈。

胡鄂公对云广英说：“广西当局对你是否中共中央派来的有些怀疑。在这情况下，我们的意见是林同志能否先回西北，把党中央指示你出来工作的任务交给我们来办。……”云认定胡有意搞鬼，以制造谣言和威吓手段来骗他走，使胡能假用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名义进行活动。云毫不客气而又严肃地批评他一番。

胡鄂公、章伯钧等倡议组织抗日反蒋政府。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杨东莼（秘密党员）主张团结御侮，反对广西开府反蒋。（注十七）胡鄂公执行的正是推动李宗仁在广西范围内立即执行抗日反蒋的各项纲领。如果李宗仁依照他的主张去做，势必导致内战。

八月中旬，蒋派大军包围广西，王公度与云广英商量如何对付。云说：“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还是以和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不过在谈判中，必须以迫蒋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为前提……我想和平解决后，继续进行‘抗日救

亡’运动，加强各方面抗日力量的团结，‘迫蒋抗日’也是可能的，请把我个人的意见转告你们的总司令。”王公度说：“林先生的意见很好，我一定向李总司令报告，……”在此之前，云广英曾电报中共中央，里面说到“他们（指李、白）反蒋是真，但是否真正抗日不太清楚。”（电稿因电台联系不上，未能发出。）

蒋、桂之所以能够避免内战，有许多因素，云广英、杨东莼也起了作用。

（云广英前来广西的情况，详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革命史资料》第10期所载云广英《特殊使命》一文）

关于“两广事变”中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派钱寿康赴陕北一事，过去没有资料披露。直到一九八三年《毛泽东书信集》出版，公布毛泽东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信，人们才知道有这回事。

李济深应李宗仁、白崇禧的邀请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廿七日到达南宁。当时蒋介石调集大军包围广西，欲以武力解决广西问题。李济深抵邕后，即与李、白等军政首要商量研究抵御蒋介石进攻广西的策略问题。几天后，李济深回梧一行。八月八日，李济深复到南宁，即连续开会两日，讨论建立政治组织问题。（注十八）钱寿康当系李济深到达南宁与李、白研究局势以后被派往陕北的。桂系当局在大军压境、剑拔弩张之时，当然希望得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声援和策应。

钱寿康是带着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前往陕北的。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二日复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信中说：“钱寿康君

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可见中共方面是十分重视并表示欢迎的。毛泽东将中共八月廿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交钱寿康带给李、白，此书对抗日救国提出了实际方案。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信中呼吁广西当局“迫蒋抗日”，内说：“现贵方与南京之间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抗日救亡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与有责焉。”

中共十分重视与广西当局订立抗日救国协定。毛泽东在信中说：“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带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带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写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最后说：“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期待殷殷，溢于言表。

（毛泽东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信见《毛泽东书信集》第70—71页）

李、白当初欲与中共签订抗日救国协定的动机，主要在

于保持地盘，此刻，蒋桂已经妥协，危机已过，订立协定之紧迫感已经消失，中共的修改稿遂被李、白搁置起来了。

五、“西安事变”中桂系与中共的关系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李宗仁、白崇禧应张学良电请，派刘仲容去西安。十二月十二日发生“西安事变”。十六日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刘仲容先去见叶剑英，叶对他讲了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团结抗日的主张，要刘仲容转告李、白。接着周恩来找刘仲容去谈话，周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深刻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团结抗日，争取民族解放，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这是全民族的需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把他（指蒋介石）放了；并说我们从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蒋介石在内一致团结抗战是完全必要的，也完全可能的。周还讲到：广西当局不是也主张抗日吗？我们赞成这种态度，一切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抗战，打败侵略者。

刘仲容把中共代表团的主张电告李宗仁、白崇禧。不久，李、白联名致电周恩来，表示赞同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西安报纸曾以大字标题对此作了报导。

（注十九）当时国民党掌握兵权的高级将领中，直接致电中共领导人表示赞同中共主张的，只有李、白二人。

六、张云逸访问桂林

张云逸同志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偕秘书李实到桂林访